

(上接 B1 版)



“根叔们”的出现:以学生为本情怀的回归

事件回放:

2010年夏天,“根叔现象”火了。
2010年6月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李培根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

“我此时的心情,或许你们经常传唱的一句歌词更能够表达: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2010年7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借用周杰

伦的歌曲《千里之外》送别3118名本科毕业生。演讲中,周其凤引用了诸如“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隐形的翅膀”、“杜拉拉”等流行字眼。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毕业典礼上提到,意大利、法国作为上届世界杯的冠军,在小组赛早早就淘汰,无论名声、传统、天赋还是金钱,都无法让他们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忘记了对球队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点评:

有人指出,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

“我总体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是肯定的。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法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江平作上述表示。他认为,“根叔现象”的出现是高等院校改变

“党八股”的一个体现。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作者李清川认为:“至少说明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根叔’还很异类,‘根叔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的大学校长角色,重新定位了校长与学生两个紧密却还遥远的群体的关联。”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李培根校长等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内容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其实是因为其中蕴涵着以学生为本的精神和情怀的回归。

“从受欢迎程度和学生态度看,现在的毕业典礼还做得远远不够。”王旭明

说,这几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引起了一阵大白话旋风,“这本是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但现在却受到重视和吹捧,将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变成不同寻常,至少说明在校长演讲的话语体系中,确实存在着官话套话。”

王旭明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大学校长能在演讲时不仅仅使用网络语言,更要说大学生爱听的实话,以及他们走向社会之后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可以结合不同大学的传统和精神,结合学生的特点,对未来提出寄语,这样除了生动活泼之外,更会有一层深刻和永恒的意义,使演讲中不仅有热闹,而且有魂。

南方科大获准筹建:“去行政化”有多难?

事件回放:

致力于建成中国第一所“教授治学”高校的南方科技大学筹备三年半,2010年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筹建,但是还没有正式下发文件。

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获批筹建对南方科大意义重大,将推动南方科大的教师招聘、学生招录等一系列工作。朱清时坦陈,虽然南方科大被海内外知名学者寄予厚望,但是由于没有被教育部正式批复,有很多学者仍然在观望。

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香港科技大学,建设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并打算革新高校体制,建立“去行政化”、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南方科大的这一探索,被中国教育改革者寄予厚望。2010年9月30日,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正式开工,预计首期工程2012年竣工。同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据报道,南方科技大学(筹)教职和行政人员薪酬体系方案已经获得市政府的正式批准。根据方案,领军教授的年薪将从115万元起步,向香港知名大学看齐。

目前该校课程设置、教室安排都已准备就绪,一旦获批马上就能招生。“虽然教育部还未批准我们招生,但是拿

‘准生证’基本没有悬念。”朱清时介绍,学校目前已经作好一切准备,包括课程设置、教室安排等。学校仍在积极申请争取近期招生,教育部一批准,就立刻开始招生程序。

点评:

一所备受瞩目的大学筹办3年还拿不到“准生证”,究竟卡在哪儿?有评论认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可“自主”到什么程度,却是需要分寸拿捏的。现在南方科大遭遇的尴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深圳的关系要“磨

合”,甚至要“习惯”校长用一台电脑也要向深圳市政府报批的惯性;二是要向主管部门公关,想尽早拿掉“筹”字,必须按照行政化逻辑。想脱离行政化,这就要仰仗于行政化的审批;立志于“去行政化”,却困于行政化的门槛。因为行政化的体制障碍而迟迟拿不到准生证,行政化给南方科大的“下马威”,让公众看到了教育“去行政化”是多么的艰难。

也有评论指出,在我们急切等待南方科大成立时,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去关注南方科大的每一步办学是否符合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要求,当下的问题是,深圳和南方科大应将《大学章程》

制订出来——这可让大家看到南方科大将建立怎样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体系。如果南方科大《大学章程》出台,而教育部门仍不批准其设立,这就是行政化以及表面改革但实质并不愿改革的问题了。

南方科大要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典范,制订《大学章程》是十分重要的起步。有学者表示,作为一所带有明显改革意图的大学,还要面临很多的未知数。比如,深圳领导换届,改变办南方科大的意图怎么办?朱清时不当校长之后怎么办?为避免这些未知数给学校的招生、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人才招聘、校长遴选等带来麻烦,应事先对所有问题



进行预估,建立保障大学财务独立性、办学自立性的基本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没有建好就仓促上马,会给未来的办学带来很大的风险。



清华学堂起火:一把火的反思

2010年11月13日,清华大学因大楼而“火”了一把。当日凌晨,正在修缮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早期标志性建筑清华学堂失火,44部消防车、308名消防官兵耗时两个多小时才将大火扑灭。大楼东部部分屋顶被烧塌,过火面积达800平方米,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发生火灾的是清华学堂东南角的一部分,清华学堂的主体结构和主要立面未受影响,主要入口也完好无损。此次火灾中,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一期工程幸免于难,过火部分属于清华学堂二期建筑。

据北京市文物局初步评估,火灾对清华学堂的木结构造成了严重损毁,是

北京文物古迹10余年来遭遇的最大一次灾害。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承认,清华学堂加固工程还未获批就发生了火灾。对于施工单位没有文物修缮资质的质疑,顾秉林表示,这是加固工程,施工单位有加固资质。

顾秉林还表示,清华学堂修缮工程何时复工,须等相关单位通知。复工后学校会加强管理,修缮工程工期应该不会受影响。

点评:

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北面的大草坪东边,矗立着一座式样别致的二层楼房。此楼为德国古典风格,青砖红瓦,坡顶陡起,这就是“清华第一楼”——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作为早期清华的象征,始终保持着她特有的历史魅力,留在了一代代清华学子的心中。

“真有些不相信,百年的老学堂,清华大学的象征建筑,怎么会起火呢?”火灾发生后,不少学生立马赶来,想亲眼求证。

一位老教师无比惋惜:“这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教室,是清华精神的源起。每个清华人,无论老少,有哪个不对这个地方有着或深或浅的感情。”

一位清华大学学生在博客里写道:“清华学堂那稀稀拉拉的绘图课桌,那吱吱呀呀的楼梯地板,那若隐若现的古旧韵味,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和青春的记忆。而如今一把大火烧毁了清华学堂的建筑,烧得真心痛。”

2011年4月,清华大学将迎来100周年校庆。伴着清华园一同诞生的清华学堂,是记录历史和寄托“大师”精神的所在,更是清华作为一所大学的精神象征。她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其实际功用。建筑终归是死的,如果没有灵魂,任何躯体都是空壳。

于是,对大学古建筑的保护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即保护大学精神的寄托。

我们总是听说,某某建筑见证了何种辉煌,经历了多少沧桑、承载过多少光荣与梦想,这一系列的词句用的都是“过去时”。对过往辉煌的过度追忆,反而映衬了当下精神与现实的苍白。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和珍视传统的民族,当历史的遗迹不能得

到很好保护时,人们难免会对令人继承优秀历史传统、发扬大学精神的能力产生怀疑。

一场火灾,使“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遭遇网友狂喷。网友的发泄可能不理性,但何尝不是人们的恨铁不成钢?

这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在清华园发生,还是让人看到清华作风浮躁的印痕。因为就在火灾发生的几天前,清华刚刚在清华学堂旁边举行了消防演习,不想几天后,这个曾经会聚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的地方,就成了火灾的现场。

清华学堂这“冬天里的一把火”,能否让攀比成风、急功近利的中国高校从急躁冒进中“激流勇退”?我们拭目以待。

钱伟长逝世:“化作春泥更护花”

事件回放: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我国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于2010年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所当时名不见经

传的地方工科大学担任校长。1994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里?’”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

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点评:

“钱伟长校长的去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北京大学原校长、经济学家兼教育家吴树青在得知钱伟长去世的消息后表示非常震惊,同时流露出了惋惜之情,他说:“我与钱校长在学术上不属于同一个领域,对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不好评价。但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在世界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树青说:“在为人方面,我认为他用谦逊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楷模。”

“去年钱学森先生走了,昨天钱伟长

先生又走了,想起来心里就难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接受采访时哽咽了,他停了停却依然无法继续,眼泪夺眶而出。

在梁思礼看来,人们对于钱伟长的怀念,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赫赫战绩,更是因为包括他在内的“三钱”为中国人民留下一座精神宝库。“钱三强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是我国导弹之父,钱伟长是我国力学之父,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梁思礼说,“他们爱国报国,丝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治学严谨,甘于奉献……为我们留下一座精神宝库,所有中国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我们应该向‘三钱’学习,学习他们的人格、学风,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抄袭风波再起:孰是孰非,“反腐”机制何在?

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在”等。

2010年7月7日,63位国内外学者在媒体上发表《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并最终公布调查结论及各委员的投票意向》。

两天后,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在凤凰网发表。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

汪晖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

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史学家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2010年4月,汪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作为学者,他反对学术不端行为。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时,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最终结论要靠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直到目前,尚无“学术共同体”来最终鉴定王彬彬的指责是否确有其事。

2010年7月11日,一篇名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的报道让朱学勤进入大家的视野。此前,《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等最新文章早已见诸网上,称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期的博士论文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

朱学勤1985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

2010年7月13日,朱学勤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动提交了调查申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已经受理,上海大学校方则同意朱学勤的要求,在调查期间,作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将主动回避,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截至目前,复旦大学尚未公布审查结论。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王彬彬已公开撰文批评汪晖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现象,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媒体辩论”——媒体评价终究不是学术评价;也不是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几个专家的意见也只是个人意见,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应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听证,以鉴定汪晖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如果没有抄袭,学位委员会可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如果存在抄袭,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

熊丙奇也关注了“朱学勤事件”。他表示,不论对于汪晖还是朱学勤,他们是否涉嫌抄袭,自己并没有专业能力判断,但是解决学术争端的基本制度应该

是一致的。

最近涉嫌抄袭、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

熊丙奇开的药方是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自治,摆脱行政的影响,学者贡献不由官方认定,不由媒体认定,而是遵从学术共同体认定的学术标准和规范,不看所谓的影响和江湖地位。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德峰表示,抄袭成为学术界的病症,不能因为学术体制的弊端为抄袭辩护,有些学者遗忘了对社会的责任,谋求体制下的利益,而“学术良知是知识分子的最后立足点,学者应该安贫乐道,良知不改”。

人大获最大单笔捐款:期待教育捐赠常态化

事件回放:

2010年2月28日,正值元宵佳节,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一笔总额高达3000万美元的巨额捐赠,约合人民币2亿多元。这是中国高校接受的最大单笔捐款之一。这笔捐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著名企业家段永平、刘昕夫妇。

据悉,此次捐款中的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这是段永平借鉴国外大学基金运行经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慈善基金捐赠和管理机制。此外,1000万美元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

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

资料显示,段永平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数量经济学研究生,1989年他南下广东创业,曾以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而闻名全国;2001年,段永平赴美开始投资生涯,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夫人刘昕于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点评:

段永平巨额捐款在引发赞叹的同时,也有人将其与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的张磊比较。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一者向国内大学捐款,一者向美国名校捐款,两个人互为参照,引发网友热议。

段永平坦言,作为一个捐款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多人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把钱捐给这个学校而不是别的学校”等等。有过多次捐资经历的段永平还表示,国内往往对捐资行为“重视过分”,但慈善机制却不健全。

办学经费、学杂费、其他经费四大类。作为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目前高校经费中来自捐赠的还不多。

在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占高校预算的很大比例,常春藤院校高达25%~45%。而我国大学社会捐赠规模不到美国的1%,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捐赠不但规模小、方式不规范,而且政策法规不配套、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捐赠行为都还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而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美两国大学在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但美国对于社会教育捐赠的运作思路和方法仍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建立有效的教育捐赠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开展大学社会捐赠的积极性,让社会教育捐赠常态化。